

关于“竟陵版”《茶经》的几个问题

——兼与童正祥先生商榷

陈靖华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唐代陆羽所撰《茶经》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著作。童正祥等所撰《“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一文,基于现存几个“竟陵版”《茶经》的部分内容差异和对其序跋的解读,得出“柯乔本”是一官刻本,并与私人刻印本“吴旦本”“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的结论。在考证相关文献史料后,本文认为“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由竟陵地方的部分志同道合者或倡议,或抄录,或校雠,或出资,共襄盛举刊印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民间的同人刻本,并且自始至终就只有一个版本。

关键词:“竟陵版”《茶经》;刊刻源流考证;民间刻本;同人刻本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5-0066-08

Issues on *Tea Sastra* of Jingling copy: Also a discussion with Mr. Tong Zhengxiang

CHEN Jing-hua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ea Sastra* written by Lu Yu in Tang Dynasty is a milestone in Chinese tea culture history. While the article *The Rare Book Style and the Publication of Jingling-Copy Tea Sastra* written by Tong Zhengxiang have some flaws on the text about the printing of the copy, and misapprehends some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ose questions about the copy of the Jingling, and found out that *Tea Sastra* was a comrade copy made by some people with similar interest in tea culture in the 21th year of Jiajing reign in Ming Dynasty (1542). They divided the work according to sponsor, transcriber, collector, and investor, and they made a concerted effort to develop the tea culture. In certain degree, it can be called a Comrade Copy, and there was certainly only one copy.

Keywords: *Tea Sastra* of Jingling Copy; research on the flow of printing and the publication; folk copy; comrade copy

《茶经》是中国古代茶文化史上一部里程碑著作,学术界对其研究得很多,真可谓硕果累累。《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刊载童正祥等所撰《“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一文(以下简称“童文”),对文题所述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拜读之余,感到有些问题尚未论述清楚,且在讨论中,还出现了一些舛误。本文仅就部分问题进行商榷。

“童文”在“考证结果与讨论”中称:“明嘉靖壬寅‘竟陵版’《茶经》是指经由鲁彭所刻之版而刊印的《茶经》。”继而称:“‘柯乔本’是官刻本。

‘柯乔本’是在荆西道监察御史柯乔(双华)‘观风竟陵’时,作为彰显当地风物、进行人文教化的一项政绩而授意西塔寺刊刻的。承揽此事的鲁彭、童承叙二位也为官员。而印数过百,在当时也是不小的规模了。由此认定该本为官刻本不当为过,被人称为‘柯乔本’也在情理之中了。”并称:“台湾‘国图本’以及‘北大本’为明嘉靖的私人印本。虽然台湾‘国图本’又名‘吴旦本’,其实吴旦‘欲刻之而力未逮’,而只是‘共寿诸梓’罢了。”“‘吴旦本’与‘柯乔本’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唯一的交集是僧真清。”“童文”上述之考证结果与讨论出现了许多问题。

为便于讨论以及避免误读,现将相关文献较为完整地引述如下并陆续进行讨论。

收稿日期: 2012 - 09 - 03

作者简介: 陈靖华(1955—),女,湖南江华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献学、宗教学和湖湘地域文化。

一、柯乔与“竟陵版”《茶经》结缘背景

明鲁彭《刻茶经叙》(以下简称“鲁彭叙”)云:

粤昔己亥,上南狩郢,置荆西道。无何,上以监察御史青阳柯公来莅厥职。越明年,百废修举,乃观风竟陵,访唐处士陆羽故处龙盖寺。公喟然曰:“昔桑苧翁名于唐,足迹遍天下,谁谓其产兹土耶?”因慨茶井失所在,乃即今井亭而存其故,已复构亭其北,曰茶亭焉。他日,公再往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公曰:“嗟,井亭矣!而《经》可无刻乎?”遂命刻诸寺。夫茶之为经,要矣,行于世,脍炙千古。乃今见之《百川学海》集中,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于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皇明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秋重九日景陵后学鲁彭叙。^①

“鲁彭叙”中的“己亥”年,“董文”作“己亥”,当为笔误,不必苛求,但该文中有不少句读错误,从而导致了文字理解的错误进而作出错误的结论,下文将会举例述及,此处不赘。

“己亥”年为明嘉靖十八年(1539)。“上南狩郢”,指的是嘉靖帝于嘉靖十八年护送其母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的灵柩归葬安陆府郢中事,其母于嘉靖十七年旧历十二月二日(辛丑日)去世。嘉靖帝庙号世宗(1507—1566),名厚熹。1521—1566年在位。为明宪宗庶孙,兴献王朱祐杬嫡子。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即位,次年改年号为嘉靖。《明史》地理志载:“承天府(元安陆府,属荆湖北道宣慰司)。太祖乙巳年属湖广行省。洪武九年四月降为州,直隶湖广布政司。二十四年六月改属河南,未几还属。弘治四年,兴王府自德安府迁此。嘉靖十年,升州为承天府。十八年,建兴都留守司于此。领州二、县五,东南距布政司五百七十里。”^②安陆府郢中为嘉靖皇帝生养发迹之地,嘉靖帝即位后,御赐县名为“钟祥”,取“祥瑞钟聚”之意;并升安陆府为承天府,是当时全国三大直辖府(顺天府——今北京、应天府——今南京、承天府——今钟祥)之一。又追谥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以其陵墓为显陵。显陵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城东北方7.5公里的纯德山上,是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父亲

恭睿献皇帝和母亲章圣皇太后的合葬墓,始建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至嘉靖十九年(1540)建成。嘉靖十八年二月,嘉靖帝护送其母灵柩合葬于显陵。“鲁彭叙”中“上南狩郢”即指此事。基于该地区的重要性,又设分巡道荆西道,驻沔阳(今湖北省仙桃市),派遣监察御史巡行以加强对该地区的控管。承天府(安陆府)又史称“兴都”,如《明史》云:“(嘉靖)十八年,巡狩兴都,帝亲制乐章享上帝于飞龙殿,奉皇考配其后。”^③俨然成为都城之一,此即《明史》所载“嘉靖十八年,改荆州左卫为显陵卫,置兴都留守司,统显陵、承天二卫,防护显陵,设官如中都焉。”^④

荆西道的设置在嘉靖十九年(1540)显陵修建完毕后,时在该年的三月份。《明实录》载:“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乙卯,改置湖广承天、德安二府为荆西道,设守、巡官各一员,从巡抚都御史陆杰奏也。”^⑤柯乔受命以监察御史身份来荆西道巡察即在此年。明人唐顺之撰《送柯金事序》云:

承天故郢都,据江汉上游,扼襄沔荆鄂之喉,自古为巨镇。今天子起汉沔,则承天为汤沐邑;且先帝寝陵所在。天子既肇建园邑,备规制,金堆之藏,焜耀山石,将与紫金、天寿相望无极,故其地视昔尤重。于是抚、按之臣请于上曰:“承天故荆南巡,属地辽阔,守巡吏岁不能一二至,且权分非所以重寝园也,请自为一道,割沔阳隶之,设守、巡吏各一人。”诏报曰:“可”。其以承天为荆西道,铸印置吏如所请。而柯君迁之,自户部员外郎擢拜按察司金事,奉敕往巡其地。柯君以学问干局显郎署间,及是行,士大夫皆以为荆西得人也。其友人武进唐某送而谓之曰:“柯君知斯职之不易乎?”盖在汉时,诸陵邑习俗庞杂,豪猾所窟穴,故天子常为选用强察能治剧吏以附循而芟蕪之,其所以销奸萌、拥护陵寝之计甚至。然是时,诸陵邑近在辇毂下耳,今承天界在南服,地故阻险,又楚人凿窟无积聚以剽悍相鼓扇,其习俗视汉时诸陵邑何如也?显陵之工为费巨矣,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藪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丘墟之间,剗而市其鬻,可谓廩廩夫。以杼轴既空之后而敛之以日溢无限之费,以转徙罢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办之

役,此在素沃土重厚之民亦难矣,况于黜腐剝悍之俗乎!欲以销奸萌、护陵寝,安得不深虑也。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柯君其无忽也哉!^⑥

唐顺之序文中所称“紫金”,即今南京市的紫金山,为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所在地;“天寿”即今北京市的天寿山,为明朝廷北迁后诸帝王的陵寝所在地。因“今天子起汉沔,则承天为汤沐邑,且先帝寝陵所在”,故“将与紫金、天寿相望无极,故其地视昔尤重”,因而有荆西道之设置。据《明实录》记载,显陵的修建耗费了“计银四十六万两有奇”的巨资^⑦,序文中披露了因修建显陵加重了对当地百姓的盘剥,“去年楚大饥,流人聚而蔽于承天左右,僵者日几何人,丘墟之间,割而市其鬻,可谓廩廩夫。以杼轴既空之后而敛之以日溢无限之费,以转徙罢弊之人而率之以趣期就办之役”,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加深了阶级矛盾,因而选择了学问能力俱强的柯乔以按察司僉事衔作为首任监察御史巡行该道,以求恢复当地的社会安定,当然更重要的职责是“销奸萌、护陵寝”。正是由于职责重大,工作繁忙,柯乔在“来莅厥职。越明年,百废修举”后,才有时间、有闲心“乃观风竟陵,访唐处士陆羽故处龙盖寺”。

柯乔在嘉靖二十年(1541)还莅任于此。《明实录》载:“嘉靖二十年二月……乙丑……参政陈焕、参议段续、副使孙应奎、僉事柯乔、参议方远宜留守黄、济江口。”^⑧这里所指为柯乔莅任于此时履行的政事之一。次年,即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三月“壬辰,承天督工尚书顾璘进所辑兴都志书,上曰:‘览所进志,亦见诸臣纂辑效劳,顾璘、方远宜、魏良辅、柯乔及王格、颜木、王廷陈等各赏银币有差。’”^⑨表明柯乔仍然莅任于此,并参与协助顾璘纂辑了兴都志书。

监察御史始设于隋开皇二年(582),明清隶属于察院,以都御史、副都御史为主官,所属监察御史分道负责,各冠以地方名称,各道人数不等,总数为110人,均为正七品官。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事务,品级相较于所巡视的某些地方官员虽低数级,但因其为“代天(子)巡狩”,故权力甚大,然而并无行政权及财权,

只有监督权、督促权及弹劾权。“鲁彭叙”称柯乔“莅厥职”的第二年(越明年)，“百废修举,乃观风竟陵”,指的就是柯乔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巡视督察荆西道所辖各地的政事。如上所述,荆西道的驻地沔阳,竟陵(今湖北省天门市)虽为荆西道御史的巡察辖县,但基于监察御史的职权所限,柯乔“访唐处士陆羽故处龙盖寺”,督促该寺复构茶亭后,“他日,公再往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柯乔再命将《茶经》“刻诸寺”,并非给予了资助,也不可能有所掌握的公帑给予资助。所谓“遂命”之语,也就是有这样的建议话语,建议话语出自官员的口,便可称之为命令,亦可比拟如同现在的某位领导说了几句话就如同下了指示一样,指示归指示,但并不表示其承担具体的刊刻费用。那么刊刻《茶经》的费用从何而来呢?“竟陵版”《茶经》所附的另外一份文献提供了答案。

二、“竟陵版”《茶经》乃民间同人刻本

明吴旦《茶经跋》云:

予闻陆羽著《茶经》久矣,惜未之见,客景陵,于龙盖寺僧真清处见之。三复披阅,大有益于人。欲刻之而力未逮。乃率同志程子伯容共寿诸梓,以公于天下,使冀之者无遗憾焉。刻完,敬叙数语,纪岁节于末简。嘉靖壬寅岁一阳节望日新安县令后学吴旦识。^⑩

“童文”在摘引该跋语时,出现了几处舛误。

其一,将“程子伯容”的名字误读为“程子伯”,称“他(笔者按:指吴旦)也在僧真清处见过《茶经》,因为无力自刻,就和程子伯一道共用了鲁彭的刻板进行刷印”。“子”是古代对人、尤其是对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之人的尊称,这位程氏实乃姓程字(或号)伯容,即名叫程伯容。

其二,将吴旦撰写跋语的时间搞错了。“童文”称:“嘉靖壬寅岁一阳月望日,说明上文写于《茶经》刻完后的农历十月十五日。”将吴旦跋语中的“一阳节”误书为“一阳月”。“一阳节”即“冬至节”,为农历每年的十一月之某日(阳历的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间)。《明实录》载:“嘉靖二十一年

十一月丁未朔……辛亥，以明日冬至节……”^①可见，嘉靖二十一年的冬至节为该年农历十一月初六日。据此，吴旦撰写跋语的时间当为该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望日)。古人在撰写书籍序跋或碑刻文字时，款识时间，往往喜欢绕圈子，此为常例，亦不必赘言。

其三，将“共寿诸梓”误解为借用他人的印版。“童文”在上述“共用了鲁彭的刻板进行刷印”语后接着说：“可能因为‘客竟陵’的时间有限，借《茶经》及相关文本的印版时……”。所谓“寿”，即镌刻之意，翻阅任意一部古文字字典便可证实，也不必赘言；“寿诸梓”，即镌刻于木版之意，又称“刻梓”。如明代王汝嘉为王绂《王舍人诗集》所撰序言称：“无锡王君孟端……永乐丙申，以疾卒于官舍。其子默哀辑遗稿，得诗若干首，汇次成帙，题曰《友石先生诗集》，将寿诸梓，求余序之。”^②又明王守仁《王文成全书》云：“朱子晚年定论，我阳明先生在留都时所采集者也，揭阳薛君尚谦旧录一本，同志见之，至有不及抄写袖之而去者，众皆惮于翻录，乃谋而寿诸梓。”^③据此可知，吴旦《茶经跋》所云“乃率同志程子伯容共寿诸梓”，表达的是与志同道合的学友程伯容一道镌刻了此书。为何要与他人一道共同镌刻此书呢？是因为个人“欲刻之而力未逮”的缘故。跋语继称“刻完，敬叙数语，纪岁节于末简”，也是该刻本为吴旦与程伯容共同出资镌刻的确证。

明人汪可立也撰写了一篇《后序》，称：

侍御青阳柯公双华莅荆西道之三年，化行政洽，乃访先贤遗轶而追崇之。巡行所至郡邑，至景陵之西禅寺，问陆羽《茶经》，时僧真清类写成册以进。属校讎于余。将完，柯公又来命修茶亭。噫！千载嘉会也。……柯公《茶经》之问、茶亭之树，岂偶然之故哉？今《经》既寿诸梓，又得儒先之论，名史之赞，群哲之声诗，汇集而彰厥美焉，要皆好德之彝有不容默默焉者也。予敢自附同志之末云。嘉靖壬寅冬十月朔祁邑芝山汪可立书。^④

汪可立《后序》所称“柯公双华莅荆西道之三年”，指的是自嘉靖十九年起至嘉靖二十一年为第三年。“景陵之西禅寺”指的是位于景陵之西部的

一所禅寺，即“鲁彭叙”与吴旦跋语中所称之为龙盖寺，又名西塔寺，而非一所名为“西禅寺”的寺院。与“鲁彭叙”一样，《后序》也说明了“竟陵版”《茶经》的刊刻缘起是出自柯乔的倡议，所用底本为龙盖寺僧人真清所录写。汪可立受柯乔的委托对僧真清所录写的底本进行了校讎，校讎所用的刊本当为“鲁彭叙”中所说的《百川学海》本。既然已经有了《百川学海》本，为何还要另行刊刻该书呢？此即“鲁彭叙”中所说的“兹复刻者，便览尔；刻于竟陵者，表羽之为竟陵人也”。换言之，作为收录于一部丛书中的《茶经》，肯定不便于传播，故有单行本刊刻的想法。汪可立《后序》中最值得注意的一句话是“予敢自附同志之末云”。何谓“同志”？志同道合者也。“同志”一词也见于吴旦的《茶经跋》中。可见，在“竟陵本”《茶经》的刊刻过程中，无论是柯乔，还是鲁彭、吴旦、程伯容、汪可立、僧真清，他们或倡议，或抄录，或校讎，或出资，都是共襄盛举、乐成其事的同志。因此，“竟陵本”《茶经》决非“童文”所认为的有官刻本“柯乔本”与私人刻印本“吴旦本”“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之分，而是一个“同人刻本”。何谓“官刻本”？“官刻本”指的是由官方(朝廷及各地各级官府)出资、官方组织编纂班子及主持具体的镌刻印刷等全部事宜而形成书籍成品的刻本。历代官刻本书籍，由于财力雄厚，一般书品都比较考究，具有字大行疏、开本宽大、纸墨精良、装潢铺陈等特点。而“竟陵版”《茶经》的刻印本质量，在哪怕是同时代(明代)诸多《茶经》的单行刻印本中，质量只能算得上是中下水平。此外，在“竟陵版”《茶经》的所有序跋中，没有任何文字透露出柯乔无论是以官府或是以个人的名义予以资助；倒是汪可立《后序》中的“柯公《茶经》之问”的话语值得注意。何谓“问”？倡议及关注也。这正佐证了前述鲁彭《刻茶经叙》中的柯乔“遂命”之语仅仅只是说说而已，当然也是一种倡议与督促，但决非资助并主持其事。汪可立《后序》中的“属校讎于余”，也仅仅只是一种排除了官员身份之个人的委托性质，而非指令性安排。须知，如果“竟陵版”《茶经》真正是柯乔以官府的名义组织并资助雕印的“官刻本”，比照惯例，一定会有柯乔亲自

所撰写的序言；而不会容许存在其他那么多以个人名义所撰写的序跋。基于柯乔在“竟陵版”《茶经》的整个雕印过程中奉献的仅仅只是倡议及关注，学术界将该刊本称之为“柯(双华)乔本”，是不正确的。

三、“竟陵版”《茶经》内容差异释疑

“童文”经校勘后已经指出，现存于大陆及台湾的几个“竟陵本”《茶经》，“印刷所用刻板完全一样，只是(书中的内容)装订顺序有别”，包括部分内容的选择或有或无的差别。“童文”正是基于这些差异从而作出其分“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的结论。那么，怎样才能解释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呢？收录于“竟陵本”《茶经》之《茶经外集》中的明人童承叙所撰《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可以解答这个问题。该通书信云：

十二日承叙再拜言，比归，两枉道从，既多简略，日苦尘务，又缺趋候，愧罪如何！叙潦倒蹇拙，自分与林泽相宜，倾修旧庐、买新畲，日事农圃，已遣人持疏入告矣。天下且多事，惟望公等蚤(早)出，共济时艰耳！不尽，不尽。《茶经》刻良佳，尊序尤典覈，叙所校本大都相同，惟唐皮公日休、宋公陈师道俱有序，兹令儿子抄奉，若再刻之于前，亦足重此书也。天下之善政不必己出，叙可以无梓矣。暇日，令人持纸来印百余部，如何？匆匆不多具。^⑮

“童文”在引述该书信时，也出现了句读错误，从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文中说：“《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曰‘十二日承叙再拜’，《茶经》刻良佳，尊序尤典覈’，‘唐皮公日休、宋公陈师道俱有序，兹令儿子抄奉，若再刻之于前亦足重此书……必己出叙……暇日，令人持纸来印百余部’。”在这些引文之后，“童文”称：“从童《书》可知：一，这封信写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见过刻成的《茶经》板，以及梦野(鲁彭)九月九日的《刻茶经序》之后；二，鲁彭曾经邀请童写序，而童认为鲁序很好，勿需另写，并推荐将陈、皮二人的序放在前面，并由儿子抄录，连同《书》信一并交给了鲁彭。”

无论古今，书信往往使用的是最为通俗易懂的

文字，否则便起不到交流信息的作用。其实，童承叙的这通书信明白易晓，并无任何曲折难以理解之处。书信中表达了多重信息。

先看“比归，两枉道从，既多简略，日苦尘务，又缺趋候，愧罪如何！”“比归”指的是从某处归来(家)。从哪里回来(家)呢？既然与鲁彭、与《茶经》有关，应该是从竟陵归来。“竟陵版”《茶经》中正保留了一份童承叙所撰《陆羽赞》^⑯的文字：“余尝过竟陵，憩羽故寺，访雁桥，观茶井，慨然想见其为人。少厌髡缁，笃嗜坟索，本非忘世者。卒乃寄号桑苎，遁迹苔雪，啸歌独行，继以恸哭，其意必有所在，乃比之接舆，岂知羽者哉！至其惟甘茗菴，味辨淄渑，清风雅趣，脍炙今古。张颠之于酒也，昌黎以为有所托而逃，羽亦以为夫！”据此可知，童承叙是从竟陵归来。“枉”为古代谦词，如称“枉驾”，则为称对方屈尊以相访之敬词；“道从”，谓前导后卫。“两枉道从”应该指的是鲁彭曾经两次陪同童承叙到某处，联系童承叙曾经过竟陵探访陆羽遗迹，应该是鲁彭曾经以地主身份作为向导陪同。但童承叙“日苦尘务，又缺趋候”，没有进行回访问候，故表示歉意。

自“叙潦倒蹇拙”至“日事农圃”，是童承叙自述归田之后的生活安排。“已遣人持疏入告矣”，既可以理解为童承叙曾经就此生活状况写信相告于鲁彭，亦可以理解为上奏疏给皇帝。据《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朔……甲戌，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童承叙乞假省亲。诏给驿还，以讲筵效劳故也。”^⑰童承叙正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二月以乞假省亲的名义归乡的。据此，童承叙这次回乡，便产生了致仕归田的念头，故有“倾修旧庐、买新畲，日事农圃”的行为，上疏求得致仕，亦为情理中事。实际上，童承叙归乡不久，就去世了。《明实录》记载：“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庚午朔……辛未……南京河南道御史包孝奏：辛丑(嘉靖二十年，1541)会试，以礼部尚书温仁和主试，翰林院编修嵇世臣为礼经分考，贿中进士徐履祥、陈志潘、仲骞，当追罢。且言左庶子童承叙之嗜酒，右赞善郭希颜之轻险，编修袁炜之放浪，俱不堪典试事宜，量行别用。时仲骞等授官，仁和、承叙已故……”^⑱可见童承叙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二月之前已经

去世，具体时间则不详，归田之后，仅仅还活了不到二年。

“天下且多事，惟望公等蚤(早)出，共济时艰耳！”表明的是童承叙对鲁彭寄予出仕治国平天下的厚望和鼓励。“童文”在谈到“柯乔本”为官刻本的理由时说：“揽此事的鲁彭、童承叙二位也为官员。”其实鲁彭在此时尚未出仕，而童承叙的官职地位及年资均远比柯乔为高，且他一直任职于京师，是在嘉靖二十一年二月才乞假省亲归乡的，因此，他不可能受柯乔之命“承揽此事”参与“竟陵版”《茶经》的刊刻工作。“童文”在引述明人李维祯《陆羽祠记》中谈及鲁彭参与刊刻《茶经》时的身份，称其为“嘉靖间邑人鲁孝廉”，“孝廉”既指孝悌清廉之士，“举孝廉”为汉代以降选拔人才的一种科目；但在明清时期，则是对举人的称呼。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举人”载：“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乡试榜……鲁彭，天门人。”^{①9}同书卷四十九“乡贤志”载：“鲁彭字寿卿，祭酒铎之子。正德丙子举人。任广东乐会令，平易近民，勤恤赈济，全活甚众。一日，海上渔人以玳瑁献，投之海滨，因作《海问赋》。去任，民为生祠以祀。”^{②0}可见鲁彭当时的身份为举人，而不是以“孝悌清廉”而被举荐的孝廉。“童文”注释称鲁彭“正德丙子(1516)以乡荐就选京师”，是片面误读了“孝廉”一词的缘故。鲁彭中举后，一直到参与刊刻《茶经》时均在家而未出仕。那么鲁彭是在何时出任“广东乐会令”的呢？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二十八“职官志”记载：“鲁彭，湖广景陵人；……邵世光，广西宣化人。俱嘉靖年任。……以上知乐会县。”^{②1}此处仅云“俱嘉靖年任”，而嘉靖纪年有45年之多，仍然等于未说。好在清雍正《广东通志》卷十六“学校志”有所记载：“乐会县儒学，在邑治之东。元延祐三年建。……洪武三年，知县王思恭重建。永乐六年，知县诸葛平建殿庑、堂斋、戟门、学门、厨库、射圃。正统二年，知县莫卿改建明伦堂于大成殿左。四年，建尊经阁。嘉靖五年，修两庑堂斋。三十三年，知县鲁彭重修圣殿、棂星门、明伦堂、两庑。”^{②2}鲁彭在广东乐会令任上的政绩除了前述雍正《湖广通志》所载者外，还主持编纂了《乐会志》八卷。^{②3}据此可知，鲁彭莅任广东

乐会县知县，时在嘉靖三十三年(1544)前后数年。此时已在“竟陵版”《茶经》刊刻的嘉靖二十一年之后的十余年，距离鲁彭中举的正德十一年(1516)已经有近四十年。史籍记载，鲁彭的出仕历官只有广东乐会令，如果他在中举后旋即出任、或不久后出任，连续担任该县的知县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在参与刊刻“竟陵版”《茶经》时，鲁彭的身份不是官员，故童承叙才有“天下且多事，惟望公等蚤(早)出，共济时艰耳！”的寄予。

“《茶经》刻良佳，尊序尤典覈”，指的是童承叙见到了鲁彭参与刊刻之“竟陵版”《茶经》的印成本，包括该印本上的鲁彭序，而不是“童文”所说的“这封信写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见过刻成的《茶经》板，以及梦野(鲁彭)九月九日的《刻茶经序》之后”。“童文”的意思是，童承叙见到的是“竟陵版”《茶经》的刻版而非印成本，是鲁彭于九月九日所撰写的《刻茶经序》手稿本而非刊载于刻印本上的文本。须知，童承叙为沔阳人，鲁彭为竟陵(天门)人，两地相距百余里地，之间还有汉水相隔，鲁彭于九月九日撰写了《刻茶经序》后，有什么必要急于送给童承叙看，并使得童承叙在三天之后的“同年九月十二日”又急于回信呢？须知，童承叙是不久前刚刚从竟陵“比归”的；况且，童承叙的书信中并未有只字片语透露出这封书信是接到鲁彭信后函复的信息，而只能理解为他们两人在竟陵交往分别，童承叙回家之后，主动向鲁彭写信表示感谢。可以断定，正是这次竟陵之行，童承叙携回了鲁彭所赠送的“竟陵版”《茶经》印成本，回家之后，加以比较，才有童承叙书信中接下来的“叙所校本大都相同”一语。此语除了能够证明他见到的是《茶经》的印成本而非“刻成的《茶经》板”外，还表明他以前也曾经对《茶经》进行过校勘，并且收集了鲁彭参与刊刻之“竟陵版”《茶经》所未收入的唐代皮日休、宋代陈师道的序，准备予以刊刻，但既然鲁彭等人已经刊印出了该书，故“天下之善政不必己出，叙可以无梓矣”，换言之，童承叙认为自己不必再刊印此书了。因此，他令儿子将皮日休与陈师道的序文抄奉给鲁彭，希望鲁彭在再次刊印《茶经》时能够收入，可以“亦足重此书也”。“童文”在引述“天下之善政不必己出，叙

可以无梓矣”两句文字时，截头去尾，成“……必已出叙……”连读，将文中的“叙”误读成“叙(序)言”的“叙(序)”，进而据此认为“鲁彭曾经邀请童写序，而童认为鲁序很好，勿需另写”。其实该“叙”字为童承叙名字中的末字，为童承叙的自称，该书信中三次以“叙”字自称，如“叙潦倒蹇拙”、“叙所校本大都相同”、“叙可以无梓矣”，可以相互印证。而且，这是古代书信中的常识性表达方式，出现误读，确实令人感到惊诧！顺便提及，童承叙这封时间为“十二日”的信，决不是写于“鲁彭于九月九日撰写了《刻茶经序》”后的“同年九月十二日”，而是更晚，因为童承叙已经看到了刷印成书的《茶经》，这是没有疑问的。

童承叙在该书信中最后说：“暇日，令人持纸来印百余部，如何？”表明他想利用鲁彭等人的现成刻板自备纸张印《茶经》百余部。这里所透露的信息，正可以解答前述“童文”经校勘已经指出之现存于大陆及台湾的几个“竟陵本”《茶经》，“印刷所用刻板完全一样，只是装订顺序有别”，包括部分内容的选择或有或无之差别的原因。

实际上，“竟陵版”《茶经》自始至终就只有、也只是一个版本，并非“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同时，它决非官刻本，而是一个民间刻本，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民间的同人刻本。但是，与出版史上其他民间坊刻本不同的是，其刊刻的主要目的是借以交流及弘扬茶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卖品，亦即初始的刊刻成品未进入坊间之书店、书铺的商品流通渠道。该《茶经》的书版镌刻出来之后，存放于竟陵的龙盖寺内，刊刻的参与者乃至部分有身份地位的有兴趣者，都可以利用这一刻板刷印成书，在刷印成书时，亦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刷印哪些内容，并进行不同的内容组合及顺序编排，这也是导致现存诸该刊本的内容有着一些不同编排顺序的原因。以童承叙之身份地位，他利用别人的现成刻板所印制的百余部《茶经》，当然只能是用于交流而非买卖。此外，这又佐证了该雕印本《茶经》不是“官刻本”，如果真正是“官刻本”，能够随时容许个人“持纸来印百余部”吗？

“童文”不止是对童承叙的书信有所误读，在

述及童承叙的生平事迹时也出现了一些舛误。如注释称童承叙为“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曾任国子司业，兼翰林院侍讲(嘉靖帝老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童承叙为嘉靖十六年(辛巳科，1521)第二甲第九名进士。^{②4}该次科举考试本应该在嘉靖十五年(庚辰，1520)进行，并且已经进行了会试，但因明武宗南巡，殿试未及进行，次年二月武宗歿，直至明世宗于四月份继位后才举行殿试。而进士必须是进行殿试后才能授予。正是如此，史籍中均记载童承叙为正德辛巳科进士。如清人朱彝尊编《明诗综卷》云：“承叙，字士畴，一字汉臣。沔阳人。正德辛巳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进侍讲。历中允司经局洗马、国子司业、左春坊左庶子。有《内方集》。”^{②5}此外，作为翰林院侍讲的童承叙也不是嘉靖帝的老师，而是包括嘉靖帝在内的皇室成员的侍读(陪读)人。在嘉靖帝确定皇位的继承人并任童承叙为左春坊左庶子之后，他才成为皇太子的侍读老师。史籍对此也有记载。清《钦定续通典》卷三十四“职官·东宫官”云：“明左、右春坊有大学士及庶子各一人。大学士掌太子上奏请、下启笈及讲读之事，皆审慎而监省之。庶子等各奉其职以从。成祖永乐时，周述进左春坊右谕德兼侍读，从皇太子居，守南都。上谕之曰：‘汝素厚重，尤资匡弼太子，虽聪明纯谨，然智或未逮，行或过中，必须尽言，庶称朕意。’……世宗嘉靖间，童承叙为讲官。上御文华殿，承叙进讲《周书·立政篇》，极陈王业艰难、周公夹辅之忠，词意婉切，上改容听焉。及册正储位，乃以承叙为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慎辅导之选也。”^{②6}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十八年二月庚子朔……癸丑。先是吏部上选置东宫官僚。得旨：东宫辅导，端本攸系。仍敕内阁详拟以闻。至是大学士夏言等疏名以请，拟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温仁和加太子少保，仍掌府事；……升司经局洗马童承叙为左春坊左庶子，杨维杰右春坊右庶子，俱兼侍讲。”^{②7}可知童承叙担任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讲的时间为嘉靖十八年二月。

“童文”中还有一些舛误之处，事属琐碎，不必再赘述。

注释:

- ①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13-114.
- ② 张廷玉等修:《明史》卷四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③ 张廷玉等修:《明史》卷六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④ 张廷玉等修:《明史》卷七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⑤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⑥ 明·唐顺之撰《送柯金事序》,《荆川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⑦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三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⑧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四十六,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⑨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九,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⑩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23-124.
- ⑪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六十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⑫ 载明王绂撰《王舍人诗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⑬ 明·王守仁撰:《王文成全书》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⑭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22.
- ⑮ 唐·陆羽撰,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122-123.
- ⑯ 此据沈冬梅校注《茶经校注》.该文亦收入清·陆廷灿撰《续茶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上之一,作“董承叙《题陆羽传后》”,文字稍有差异,但似较之更为完善,谨录于此,以供参考:“余尝过竟陵,憩羽故寺,访雁桥,观茶井,慨然想见其为人.夫羽少厌髭缙,笃嗜坟素,本非忘世者.卒乃寄号桑苎,遁迹若雪,啸歌独行,继以痛哭,其意必有所在,时乃比之接舆,岂知羽者哉!至其性甘茗笋,味辨淄澠,清风雅趣,脍炙今古.张颠之于酒也,昌黎以为有所托而逃,羽亦以是夫!”
- ⑰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五十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⑱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八十三,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 ⑲ 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三十五“选举志·举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⑳ 清雍正《湖广通志》卷四十九“乡贤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㉑ 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二十八“职官志·明知州知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㉒ 清雍正《广东通志》卷十六“学校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㉓ 见明·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七“地理类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㉔ 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506.
- ㉕ 清·朱彝尊编:《明诗综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㉖ 清《钦定续通典》卷三十四“职官·东宫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㉗ 《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二百二十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

责任编辑:曾凡盛